

# “杀马特”是种城市病

舆情

## “最严吏治” 塑造官德

本周网络舆情继年初低位徘徊后,关注度明显上扬。舆论场层面既有网络曝光“陕西省委党校副校长不雅照”的香艳事件,又有深度追问“香格里拉古城大火可否避免”的网络谴责,自媒体开始了新一年的舆论监督。同样,本周传统媒体的揭黑也很给力,“哈理工MBA招考作弊”与“电子礼品卡成公务送礼新腐败”都是舆论焦点并迅速倒逼机构做出回应。临近年底,中央连发15道禁令约束公务员也在释放“最严吏治”的政策信号。

### 监管法治化列上日程

回顾2013年的吏治政策,从“八项规定”到“六条禁令”再到“四风建设”,前一年搭建的政策框架正在逐步充实,2014年公务员面临的“禁令”更有增无减。从舆情分析看,目前实行的政策从公务接待细化到公务员生活,预测未来的政策不仅会强化细节的落实,也会着眼于舆论呼声比较高的“官德”塑造。

“官不聊生”是悲情还是矫情?中纪委三次全会公报再次强调“严禁公款宴请、赠送节礼、违规消费;严查领导干部到私人会所活动、变相公款旅游;将领导干部收受礼金行为纳入重点纠正范围”,公报还要求,查处的同时还需点名道姓通报曝光,媒体评论给予了坚决的支持。《人民日报》连续三天刊发文章点评“为官不易”说,明确指出:所谓的“为官不易”,只不过是让各级干部守住底线、坚持原则、不要违法乱纪而已,并直指“为官不易”是贪官不好当了,庸官不好混了,坏官不好受了。

公务员管理“严”字当头,监管法治化需要列上日程。要斩断灰色利益链,明晰公权力运行状态,只有靠“法律”规范才无禁区,因此“最严吏治”政策的开始也是法治化进程的开始,用法治完善监管应该进入改革日程表。

要斩断灰色利益链,明晰公权力运行状态,只有靠“法律”规范才无禁区,因此“最严吏治”政策的开始也是法治化进程的开始,用法治完善监管应该进入改革日程表。

### 舆论监督

#### 成官员“金箍”

陕西省委党校副校长秦国刚在这个年末,以“骗睡女研究生”的方式占据了各大媒体的重要位置,成为2014年网络反腐倒下的“第一人”。这场“香艳大戏”背后,新一年的网络反腐依旧和传统媒体舆论监督一样占据“正面战场”。但官方应对快速而果断,基层官员应对舆论危机的媒介素养显著提升,也是新的亮点。

梳理该事件可见,从1月13日网友公布不雅照,到1月16日陕西省纪委对秦国刚涉嫌严重违纪问题进行调查,官方配合舆论只用了前后不到4天时间,如此快速的反应迎合了舆论期待。《南方日报》就此肯定了网络反腐的重要性,认为反腐败必须保持“露头就打”,评论认为“色”与“腐”往往相互伴随,通过查“色”来反“腐”,体现的也是一种“露头就打”的态度;《新京报》则从另一个角度评论称,“师德只有更低没有最低”,表达了该事件中对党校教师群体师德堕落的失望。

反观该事件,虽然舆论监督再展威力,但地方的快速应对显然跑赢了舆论批评,可见随着网络舆论场下沉,政府部门在处置网络舆情中呈现了较高的媒介素养。目前网络舆论监督呈现出“短、平、快”的传播趋势,成为官员的“金箍”,而官方响应也在朝着“稳、准、狠”转向。

(作者系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主任分析师)

“杀马特”发音接近英文smart,这个本翻译为“时尚、聪明”的单词,却彻底变了味。这个充满歧视味道的词语,代表了主流人群眼中另类甚至怪诞的年轻人形象,他们顶着五颜六色的长发,化着艳丽的浓妆,搭配着稀奇古怪的衣服和饰品。他们多是“农民工子弟”,偌大的城市生活和他们在排斥了他们的父辈之后,再一次将厚厚的隔膜矗在他们面前。农村故乡,他们无法回去;新鲜城市,他们难以立足。所以他们选择了用夸张的形象和放纵的行为来释放,来标新立异。

本报深度记者 郑雷



“好像无法无天,

这就是潮流”

宋维刚刚剪掉了足以盖过面颊的长发。老板总是嫌他头发长,更重要的是,他不想再跟“杀马特”这个词有任何联系。

这个1994年出生的男孩,是济南高新区一家饭店的服务员。晚上11点半才下班,宋维和同事回到宿舍,脸上写着疲惫。不到二十平方米的小屋里住了四个人,木板搭成的大床是个大通铺,宋维和两个工友睡在上面,另一位工友睡在小床上。

老板给房间里装了wifi,四个年龄相仿的年轻人,偶尔闹腾一会,其余时间都用来打电话,或者玩手机游戏。

到凌晨两点,四个人齐齐睡去,因为第二天八点半要准时出现在饭店,重复每天的工作:准备食材,听老板讲话,端盘子以及打扫桌子和地板。

2009年,在潍坊安丘老家读完初三后,宋维就再没上学。偶尔回想起校园时光,宋维说,最后一学年,他和同学疯狂逃课去网吧玩网游《穿越火线》。

“一直玩穿越火线,连杀时,爆别人头时感觉很爽,打了第一,就截个图,发到QQ空间里,被人打死了,就开始骂。”在网吧的烟雾缭绕中,这个成绩并不好的初三学生得到了情绪的释放。

毕业后,宋维先是在安丘一家小化工厂做保安。“工作很枯燥,我就白天上班,晚上在网吧通宵玩穿越火线,连着坚持了十天,最后请了一天的病假睡觉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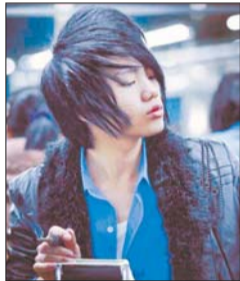
这段经历,宋维记忆犹新,他那时觉得自己接触的人群,好像个个都碌碌无为、没个性、穿着千篇一律的衣服。也正是这时,他开始觉着“杀马特”风格很酷:夸张的发型、怪异的服饰、浓烈的妆容。

“那时候还不知道杀马特这个词,只是在网上看到他们的照片和视频,年纪和我差不多,爆炸头发着各种颜色,首饰稀奇古怪,浓妆,好像无法无天,我觉得这就是潮流,得跟别人不一样。”宋维说。

2010年新年刚过,他就辞掉了保安工作,转身钻进安丘市区一家美发店里,花300元,将刻意留到盖过下颚的头发,染烫成了红棕色的刺猬头。

自此,每天起床后,宋维都要用哑光色发胶,花半个小时打理发型。虽然没有化妆,但宋维的QQ空间里满是漆黑和骷髅,身上是夜市地摊上买来的艳丽衣服,他并不了解自己的行为,被外界看做是对日本动漫、哥特文化和重金属的低劣模仿。

“走了这个路子,认识了一些朋友,那时候就是能吹能



流水线上的“90后”,“杀马特”的发型是他们置顶的情绪表达。(资料片)

装,装出自己很厉害,认识多少人,谁都不要来惹我。现在想想,自己什么都不是。”宋维说。

宋维曾到泰安当洗车工,每当不同的“小帮派”之间要对着干时,宋维和其他一些打扮夸张的年轻人经常会被叫去,出场费一人一百,动手的话就给三百。

“他们是真的看不起我,觉着我跟凤姐一样”

“济南很大,让我觉着晕,这里机会也多了。”

2012年2月,从济南客车站出来,宋维第一次来到省城。拥挤的人流和寒冷的天气,让这个腰带和裤子中间连着铁链,戴着三十元耳机的年轻人,没了方向。

老板派人开车把宋维接到了高新区,自此,这家中档消费的饭店和简陋的宿舍,便成了宋维和工友们日常生活的起点和终点。

如今加上提成,宋维每月能领到两千多元的工资,对于一份从早上八点半连续耗到午夜的工作来说,这个收入显然不算高,勉强够他充话费、买衣服。想买点儿稍微贵重的东西,就得使劲儿攒钱。

在饭店里给客人上菜倒水,宋维经常听他们讨论山东哪哪好玩,但他都没去过,连济南的景点都没机会去。

在饭店和宿舍之外,宋维和同事常去的是济南的洪家楼和芙蓉街。如果能在晚上十点半之前下班,他们偶尔会跑到洪家楼吃个便宜火锅,或者一碗芙蓉街的米线。一周歇一天的日子,他就在宿舍睡觉,这是对“晚上不能睡、白天睡不醒”的工作的补偿。

离饭店不远是山东省博物馆和奥体中心,那里有全山东最好的艺术品、体育比赛和演唱会,他和同事从没看过。

来济南接近一年时,宋维认识了一位洗脚店的按摩技师。这个比宋维还小一岁的农村姑娘,有一次小声地问他,“别人老是说奥体中心挺好,我们这种人也能进去吗?”

宋维记得当时自己一脸不屑,告诉这个小姑娘,他们当然可以进去。“可是我也没去过,整天要在饭店里,去那

里干什么?”宋维又跟了这么一句。

来济南之前,宋维一直觉着自己的打扮挺酷,“在哪里都能吃得开,最起码让别人不会小看我”,而这个想法像是被风吹了一样,最后吹到了相反的方向。

有一次宋维把菜端进包间后,来吃饭的一位女顾客问他,“你把头发弄成这样,自己觉着真的好看吗?”

在进出包间的过程中,宋维听到这桌客人谈论了很久“杀马特”“亚文化”这些词,最后那名女顾客告诉他,自己是一名大学教授,还告诉他,他的这种形象很傻。

“她是个脾气很好的老太太,也没有恶意,可是我真的很难受。原来我觉着别人不敢打扮成我这样,所以嫉妒我害怕我。听她说完了,我明白他们是真的看不起我,觉着我和凤姐一样。”宋维说。

“杀马特”一直在试图接近城市文化,将cosplay生活化,然而对于日本动漫、哥特文化、重金属的模仿,需要成本,这不是宋维这种收入可以承受的,他们无法承受高价的发型染烫设计和动辄上千的服装,更没有这些文化的底蕴和理解。

宋维有个比自己大两岁的老乡,在济南的马路边安装石头平台,也是染烫成深黄色的爆炸头。这位老乡曾经告诉宋维,只有往地里打电钻时,路人才会正眼看他一下,却都是嫌他吵,甚至包括那些看起来比自己打扮还差的人。

“当时觉着很酷,现在觉着自己很傻。那些我想成为的人,都觉着我挺土气,看我的笑话。”宋维说。

### 仿佛是一个轮回

一次偶然,在网吧里,宋维看了《盲井》,电影里讲的是面临生命危险和诈骗的矿工生活,这让他很长一段时间里,为自己的爸爸提心吊胆。

宋维的爸爸是一名矿工,从他记事起,爸爸就很少在家,一直在外地不同的矿井打工。这个憨厚的农村人常跟自己儿子说,自己矮,适合下井。

初中时,有次爸爸回家过年,宋维问他,一个人在别的城市是什么感觉?

爸爸告诉他,自己白天下井,晚上睡觉,平时住矿上,难得进城,也很少和城里人说话,买了啤酒小菜和工友喝酒,是最开心的时候。

宋维的爸爸有些话并没有告诉他,同村出去在建筑工地打工的一位堂哥告诉他,在公交车上,有些城里人嫌他们土里土气,更嫌他们脏。

这仿佛是一个轮回。作为第一代农民工的父辈们,穿着地摊上买来的衣服,手里拿着廉价的山寨手机,而他们亲手建设的城市,却没有真正能让他们落脚的地方。

十几年过去了,他们的后代从农村里走出来,城市大门为他们敞开,却有层厚厚的玻璃在中间阻隔。

在老家人眼里,一些“农民工二代”花枝招展,脱离了与土地的联系;在城市里看来,他们骨子里透着乡土气息,还是不折不扣的“杀马特”。

对于离开了两年的家乡,宋维并不想念。他不想回家种地,也不想县城的小工厂打工,更不想娶个邻村的媳妇,庸庸碌碌一辈子。

在“充满机会”的省城里自食其力,却也让他觉得没那么容易。

宋维之前曾在泰安的一家酒店里当过三天服务员,“当时很抵触,想着这辈子都不要当服务员。”

结果不久前,这个20岁的年轻人又遇见了一位蛮不讲理的客人。他按照客人吩咐,把茶壶放到了门旁的小桌上,可对对方喝多了,一再坚持说宋维没给他茶壶,还大声骂娘。最后是经理把这个吓坏的年轻人拽到了一旁。

剪了头发后,宋维用自己攒了几个月的工资,花了四千多块买了部苹果5手机。这个迄今买得最贵的东西,让他有了点面子。但他自己也觉着,这部手机,和他脚上一百块钱的鞋子和身上二百块钱的棉外衣,有点不搭。

如今,店门口停着奔驰车或者夸张的摩托,他还是会拍下来,上传到仍残留着黑色和骷髅的QQ空间里。

“过了年我就不想当服务员了,想去学车,给个老板做司机。”现在的宋维,想着以后的自己能在济南过上有车有房的生活,他也知道这很难。